纪 念

《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

它展示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

□陈众议

今年是《世界文学》65岁生辰。算上最早的《译文》，则《世界文学》已经走过了85个年头。但是，已届耄耋之年的她依然英姿勃发，豪情万丈：没有奴颜媚骨，没有惟利是图，有的还是“五四”以来鲁迅高举的那面旗帜——无数前辈用血和泪洗染的这面旗帜，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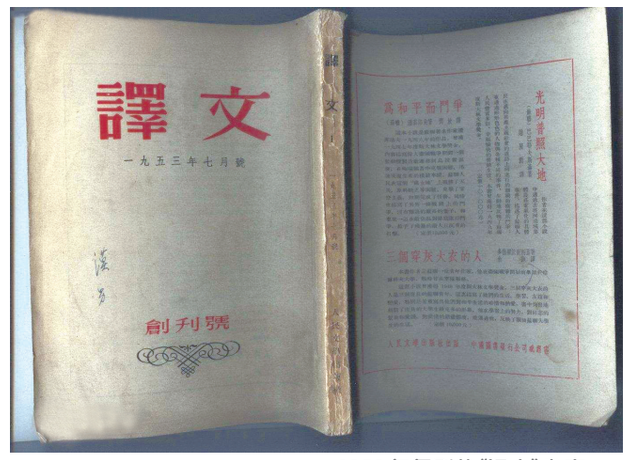
据朱少伟考证：1934年初夏，茅盾来到鲁迅寓所，谈起《文学》杂志推出了两期外国文学专刊，激发了同人的翻译热情。鲁迅听后，认为应该创办一份译文刊物，茅盾恰好也有此意。随后，在商议《译文》出版事宜时，鲁迅表示：“编辑人就印上黄源吧！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我来做。”9月16日，《译文》在上海面世。内容以翻译外国现实主义文艺为主，创作和评论并重。而现在的《世界文学》也正是这样做的。

鲁迅主张将《译文》办成译介外国文艺的精品杂志，他在《创刊号前记》中申明：“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鲁迅亲力亲为，不但悉心投入翻译、编校工作，还抽空为其他译者撰写后记。黄源后来在回忆恩师时说：“《译文》开初的三期是鲁迅先生亲自编好的。”虽然，《译文》从第四期开始由黄源接任主编工作，但鲁迅依然很关心这一刊物。1935年9月，《译文》至第二卷第六期因故停刊。翌年3月，《译文》得以复刊（卷期号另起），鲁迅写了《复刊词》。到1937年6月，由于时局动荡，《译文》出至新三卷第四期被迫终刊，共印行29期。在《译文》出版期间，鲁迅倾注了许多心血；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中提到，先生在病逝前一天还强撑着仔细看了《译文》刊发在报章上的告示。

1953年，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推动下，《译文》再次复刊，茅盾先生亲任主编。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刊物不得不再度关门大吉，及至“文革”结束。“文革”结束后，《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遥想那个遍地书香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文学》的印数一度达到数十万册，为改革开放插上了美丽而灵性的翅膀。

如今，除了资本、市场等，我们还面临由此及彼、四面八方袭来的浮躁、泡沫和量化，甚至见怪不怪地看自家洋相和胳膊肘往外拐的现象等等。鲁迅眼里“最不私利”的文学已然并将越来越遭受资本、市场和形形色色潘多拉匣子释放出来的东西的污染。所谓的“世界文学”时代，除了我们眼前的这一册，无非是中外达姆罗什、卡萨诺瓦们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世界文学”的时代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统治世界并将一切化作它的颜色、模样时才会真正来临。而这是我们非常不情愿看到，却似乎又难以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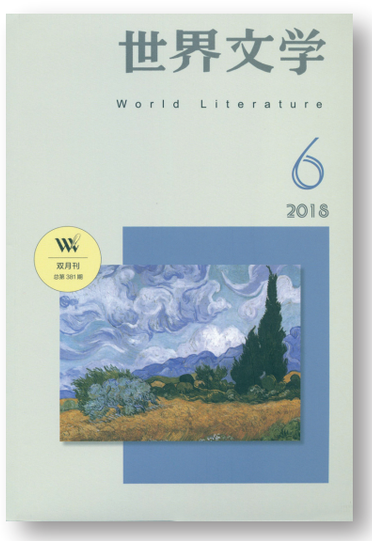
但是，《世界文学》仍在努力向国人、向世人展示世界文学的现实存在。她既是欧美文学，也是亚非拉文学：一切真实的、美好的、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



1953年复刊的《译文》杂志

字吸，歌呼

□钟立风



以前绍兴有一家南方书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南方书店不对外营业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可喜的是创办人之一，又在八字桥旁边开办了另一家书店——荒原书店。书店对面是一个天主教堂，店主取名“荒原”，一方面是向艾略特致敬，但通过这个名字，我们也能感受到书店主人的一种笃定甚至孤绝，他把自己几十年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书店中，他断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开这家书店，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安宁，打造一座自己的精神避难所，活在自己的读书世界里，自得其乐。在《世界文学》中，我也能体会到这种内心的安宁。

我个人非常感谢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对我的影响。最初创作时，我总是一门心思投入在音乐里，但很快就知道任何艺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影响的，彼此之间有很多隐秘的联系。写作、谱曲与我来讲是一种想象力的拓展，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游戏般的快感，这样的感受在很多层面上来讲都是由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带给我的，读到一篇有趣的小说甚至几行诗句，我接下去的旋律走向都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创作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和弦，找到更多的节奏变幻。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如果音乐是我的白天，那么文字就是我的夜晚，是它们完成了我的呼吸，字吸、歌呼。

接触外国文学之前，我读中国古典文学时，比如《老子》《庄子》以及《易经》，会有一种更加深度的思维，一种往土地深处扎的感觉；而读到国外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写作方式往往给我更多想象的空间，很多深埋的情感记忆突然被唤醒了的感觉，神秘而性感！就是说，这个东西并非是某部外国文学作品直接给予你的，而那个东西你本来就有，只是长期以来沉睡着，一旦进入文本，就把你内心这些隐秘唤醒、调动了起来，成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我通过翻译体感受到国外作家简洁的笔调和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所以，对我来讲它们正是“一阴一阳谓之道”。但是任何好的艺术到了一定高度，就因为拥有共同的人性而没有了界限。

当我们在看到一本有意思的、有余味的国外作品时都会感叹：这个作家写得太精彩了太好了！于是我们去找寻和这个作家相关的一切：书、作者，一本好书总会自动繁殖，神秘，无边际。可当读文章感到费劲不流畅时通常会说：翻译得不好，不好读！所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觉得译者的重要性，今天，我可以读到那么多好的文字，遇到这么多的国外作家，受到他们思想的引领，真要感谢译者们的默默劳作，能够让我们读到那么多有益的书籍，感受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灵魂和思想与自己相同的人，并为此感动，不再感到孤独。

异域先贤及其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

□汗 漫

我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作为作者，我曾经在“中国作家谈世界文学”这一栏目发表随笔，在5年内写下30万字左右的读书随笔，结集为《一卷星辰》《居于幽暗之地》。

作为读者，《世界文学》使我得到了读书生活的路标，也提升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天际线。只有去读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写出值得一写的文字，度过值得一过的人生。我不懂外语，只能通过翻译家的劳动，认知那些外国作家的面孔与内心。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作家，与异域先贤们进行着隐秘而伟大的合作，从而完成了那些异域思想景观的汉语表达。

自古至今，正是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乡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中国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人、就是世界，语言的边界拓展到哪里，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就深入到哪里。正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冲突与融汇，造就了当下中国和世界的新风貌。

唐玄奘就是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涅槃”“刹那”“众生”“觉悟”“禅”“因果”……汉语中约有3000多种词汇，来自对佛经的翻译。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有开山之功，而“开山”的资源，正来自于他对俄国、德国、日本、法国众多作家们的翻译，来自于他对异域人生的认知与勘探。《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也正是鲁迅先生创办的。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人的现代性，离开翻译，离开外部世界的参照与支持，无从谈起。

当下，有些人用“翻译体”这一说法，表达对某种欧化语言风格的不满和不屑。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陌生感和先锋性的拒绝和回避。西方语言所具有的个人性、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汉语中公共性、感性的过度泛滥所带来的隐疾，从而更加准确、客观、有力地面对这剧变中的世界。

作家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汉语的美与力，也只能通过表达的陌生化与思想的先锋性来实现。就像异邦“陌生的”“先锋的”马铃薯、番薯、玉米、西红柿、棉花、辣椒进入中国，使长期依靠本土的黍、稻、麦而维持生存的华夏民族，在遭逢种种战乱、屠戮、瘟疫之后，能够从汉唐时期的6000万人口，增长到清末的4亿人口——大地和节气是翻译家，而翻译家也应该像大地和节气，将种子转换为食粮和人间烟火。

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被翻译的外国文学就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异域先贤借翻译家之口，像表演双簧一样，传达了来自陌生世界的新认知、新惊喜。向那些异域、异样、异常的表达献上敬意，这并非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汉语在开放中只会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而不会夭亡。正如奥登所说：“翻译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限度。”另一方面，翻译也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深度。从五四到当代，包括翻译家在内的写作者们，汲取异域文学的营养，赓续汉语的伟大传统。比如，郭宏安翻译加缪时，为了呈现其言语中“高妙的贫瘠性”（萨特），就时常翻阅揣摩先秦散文，在祖先简约节制的言说风格中获得呼应和启发，继而为加缪进入汉语铺平道路。

1935年，周作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卷，在“序言”中对现代散文文体建设进行了思考：“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这些话让我感动，它体现出了汉语的自信与开阔。翻译家的劳作就是争取“外援”，使作家们的“挖掘”、历史的“内应”，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汉语文学传统这一条大河，由于众多支流的不断支援，而生生不息、一往无前。

我想以此来表达对翻译家、对《世界文学》的敬意。优秀的翻译家，是异域先贤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通过他们，汉语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新人”，比如，里尔克或者说冯至，济慈、雪莱或者说穆旦，罗曼·罗兰或者说傅雷，杜拉斯或者说王道乾，布罗茨基或者说刘文飞，等等等等。

我喜欢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一首名诗《自画像》，其中两句是：“*我总跟那个同行的人说话，/是他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我不欠你什么，而你欠了我所写下的东西。*”“那个同行的人”、“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的人，就是一代又一代异域的、祖国的先驱和前贤。作为阅读者，我是羞愧而又幸福的负债人。好在，我还是一个写作者，那就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偿还一点债务吧。

译介之旅

翻译研究的格局与问题

——从赵稀方《翻译与现代中国》谈起

□李 今

赵稀方将其翻译新论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虽说过于宏阔，却点明了新世纪以来他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面向，其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都是他在这一面向的探讨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翻译之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虽说有点不言自明的意思，不过，如果借用冯友兰说的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经学时代终结的观点为参照，当更能认识翻译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型中的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泛论经学时代”一章中曾谈到，“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即使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之初，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经学之旧瓶装此绝新之酒”。但西学之新酒的至多至新，通过翻译为中国输入了全新的概念、术语、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终使“经学之旧瓶破”，彻底结束了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因此，翻译不仅成为打造新瓶之材料，而且现代新见也要依傍翻译之名、翻译之术语以发布，以表出之。这表现在政治、文化、哲学、文学各个领域，整个20世纪贯穿了一个百年的翻译运动。因此，要研究现代中国不能不研究翻译，翻译是和现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当今学术界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翻译的问题，重新审视、反思与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翻译的政治及其文化实践。

在翻译研究领域，赵稀方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也能够立于学术前沿的位置，因为他不仅是西方最新理论的译介者，更能够将其融会贯通，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具有标本价值的汉译现象和文献，并将其置于本土的历史语境之中，发掘和透视中西相遇所生发的种种问题。其最卓著的示例当为书中《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明清“译名之争”》和《天演与公理——〈天演论〉与〈民约论〉》的研究。

这两篇文章所叙论的，无论是God的汉译之争，还是《天演论》和《民约论》的译介问题，无疑都可称得上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文化事件。一般学者从God“译名之争”引发大清帝国与罗马教廷彻底分裂、导致康熙皇帝的禁教事件，看到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冲突与翻译的政治问题，而赵稀方则能够以后殖民理论烛照历史现场，通过爬梳《万国公报》“圣号之争”的纷纭异说，不仅辨析出新教内部欧洲教会与美国教会之争，更能体悟到中国教士所以拼命主张中国古代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神，是因为他们蒙受儒家文化的教养，却又信奉西方基督教而导致的认同分裂所致。他们只有通过将基督教God汉译为中国传统的“上帝”才能够巧妙地弥合这一分裂，达到既报效国家，又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功效，由此揭示出“译名之争”背后更深刻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严复译述赫胥黎著作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天演论》和杨廷栋意译卢梭 *The 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论》）的《民约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兴起于中国之前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的两部译作。虽说早有学者指出，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赵稀方在对读原作与严复汉译增删之异的基础上，清理出严复汉译《天演论》不仅对赫胥黎进行了改写，还通过按语引入了斯宾塞的“物竞天择”铁律。实际上风行一时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来自斯宾塞，并非赫胥黎，赫胥黎著书反对的恰恰是这一观点。不仅如此，赵稀方更进一步溯源探隐，不仅将其置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参照中，也把它放在晚清传播的流变中，揭示出进化论原意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在中国受到漠视，反而经由革命派的鼓吹，和平的进化论被改编成为革命进化论的变异，从而揭示出翻译与历史的吊诡。杨廷栋将卢梭《社会契约论》汉译成《民约论》也是如此，使“天赋人权”成为国人反抗清廷，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根据。实际上卢梭《社会契约论》里只有一句话提到，人民有权利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其主要内容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在鼓吹革命。由此具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何为中国晚清革命所改写和利用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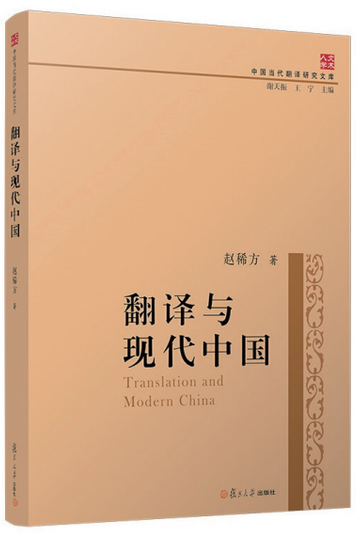
除此以外，《翻译与现代中国》围绕着侦探小说类型、《新青年》《学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译通报》、香港《文艺新潮》等几部杂志的汉译，还有“名著重印”、翻译女性主义和俄苏文学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展开了诸如翻译西方法律制度；反思近代汉译《茶花女》以来，崇尚感伤浪漫和底层批判，而忽略了西方文学中理性典雅传统的翻译引入问题；翻译的当代转型与延安整风运动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关联；香港翻译法国存在主义与对抗美国文化价值的特殊功能；翻译人道主义理论与新时期的思想复苏等等，都是在翻译与现代中国的大关怀下所进行的视野宏大的深入探究。赵稀方以一人之力显示了翻译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所需要的通观性大格局，不仅横跨宗教、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在他的专业文学之中又横跨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香港文学、俄苏文学等学科。从理论上又涉及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人道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派翻译理论，具有纵横中外古今的驰骋之气象，表现出作为翻译研究的学者应有的学养和视野。可以说，该书昭示出翻译研究的基本性质，就是跨学科。

赵稀方的研究也说明回望与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译介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与一般的影响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后者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偏重于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研究路子使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反而成为被动的从属者。事实上，中国向来是以自己的需要，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主动“拿来”，并加以改造、融通和利用的。更重要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也主要通过译介这个转换机制而实现。无论是翻译还是批评、介绍和阐释都经过了中国翻译家、理论家和史学家的改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量外国文化–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首先要立足于译介这个转化环节进行比较和影响研究，对译介的研究可以为重新审视、衡定和叙述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历程和近现代中西交流与比较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重建新的图景。

最后，我想就书中提到的《红与黑》翻译论争谈一点看法，这涉及如何对待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化转向后的新兴翻译理论的问题。我觉得两者最好不要在时间上进行落后与先进的评价，实际上，两者针对和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我以为集中于如何翻译才能弄清与原著对等的传统翻译理论，大致相当于詹姆斯·霍尔姆斯所划分的应用翻译研究，即为翻译提出政策性建议以及开展翻译批评。它一向隶属于外国语翻译的专业。对于应用翻译专业来说，以原作为基准，对等翻译的原则是其本体性的价值观。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所开拓的新的研究路子，被学界称作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从历史的翻译现象出发，看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尤其是更为复杂的文学翻译更多涉及译语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译者、赞助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这一翻译研究学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原著中心论”相对立地倡导，以译本为中心，超越语言层面，在更宏阔的语境、历史、传统视野下，注重考察影响原著选择、翻译过程和译本接受的各种文化因素，不再局限于传统翻译研究所探讨的译作如何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问题。

总之，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是在两个研究路向上发展的根本不同甚至是相反问题的思考。传统翻译研究归根结底探讨的是翻译怎样能与原著对等的问题，是对翻译实践本身的研究与批评；而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恰恰要从原著与译著的相异部分起步，探究译著为何与原著不同的问题。前者处理的是翻译本身的专业问题，只要有翻译出版，就应有评判其高下优劣的批评建议活动，以发挥监督与改善的作用；后者虽然把翻译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不以推动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目的，而旨在描述与探究文化、历史或文学史的图景和问题。所以，为更好地加以区别起见，我主张将文化学派的中国翻译研究专称为“汉译研究”，以与传统翻译研究相区别。



尽管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研究的新范式，但翻译专业仍有其不可动摇的原作基准价值观，以及汉译研究所不涉及的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和领域。这样说并不是想画地为牢，恰恰是要解放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探讨的不是如何翻译的专业问题，而是通过汉译现象研究中国哲学、政治、教育、文学等的历史与文化问题，这一面向的研究不仅跨学科，而且属于各个学科，只要有汉译的学科，都可以进行翻译研究。